

海 外 学 林

规则的动态演变

——成文组织规则的变化

[美] 詹姆斯·马奇 马丁·舒尔茨 周雪光 著

James G. March The Dynamics of Rules 童根兴 译
Martin Schulz
Xueguang Zhou — *Change in written organizational codes*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规则的动态演示

通过动画演示，

可以更直观地理解

一些抽象的数学概念。

例如，对称性、周期性、

收敛性、极限、函数等。





规则的动态演变

——成文组织规则的变化

[美] 詹姆斯·马奇 马丁·舒尔茨 周雪光 著

James G. March The Dynamics of Rules 童根兴 译
Martin Schulz
Xueguang Zhou — *Change in written organizational cod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规则的动态演变 / (美) 马奇 (March, J. G.) 等著；

童根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书名原文：The Dynamics of Rules

ISBN 7 - 208 - 05480 - 0

I . 规… II . ①马… ②童… III . 组织学

IV . 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025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 任 编 辑 钱济平

装 帧 设 计 王晓阳



规则的动态演变

[美] 马奇 等著

童根兴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3

字 数 211,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08 - 05480 - 0/C · 197

定 价 26.00 元

致 谢

本书是合作努力的成果。这个计划始于我们三人对舒尔茨和周雪光的学位论文的讨论，这些论文最终扩充成几篇有关规则发展的文章（Schulz, 1992, 1993, 1998a, 1998b; Zhou, 1991, 1993, 1997）；这个计划也始于马奇对制度和组织学习的研究，他在同期出版了一些著作（March and Olsen, 1989, 1995; March, 1991, 1994a）。在我们各自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几年之后，我们重又建立了合作关系，来更精确地提炼有关规则及其动态演变的基本思想，同时重新分析舒尔茨和周雪光有关斯坦福大学规章制度的数据。这次分析采用的方法能更清晰地阐述组织适应理论之间的关联，同时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规则间作了系统化的比较。

在这些年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过去两三年中，我们三位作者在阐明本书观点方面做了共同的努力，合作进行了问题整理以及数据编码工作，并且推进了分析和解释。我们已经利用了各自以及共同的成果，试图确认一些特殊的例证，有人对这些例证作出了特别贡献（譬如，周雪光有关历史时期和议程效应的工作，舒尔茨关于密度效应的工作，以及马奇有关组织学习的工作）。但整本书并不意味着某位作者的思想更具有优越性。因而，作者的名字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偏颇之处，而且我们并不能——即使我们想这样做——区分出我们个人的贡献。

任何诸如此类的计划都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此项研究得到了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的资助。这项资助不仅慷慨，而且对于研究来说代表其他很多批准机关的那种不耐烦与科层阻碍，与他们令人惊异地绝缘。斯宾塞基金会是资助者的一个典范。我们希望这本书可以成为对它们高质量资助的部分回报。

在学术方面，我们要感谢组织研究小组成员的同事们的帮助。尤其要指出的是，我们要感谢雷蒙德·巴切特（Raymond Bacchetti）、弗兰克·多宾（Frank R. Dobbin）、莫文·李（Mooweon Rhee）、苏珊娜·斯托特（Suzanne Stout）、大卫·斯特朗（David Strang）、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莫里斯·泽尔德奇（Moris Zelditch）深刻而有益的评论。

在更一般的层次上，我们除了对马克斯·韦伯及其所开创的智识传统心怀感激外，我们应当感谢从韦伯思想中获取洞见的下列人物。这些人包括罗伯特·阿克西尔罗德（Robert Axelrod），大卫·布雷布鲁克（David Braybrooke），尼尔斯·布伦森（Nils Brunsson），迈克尔·D·科恩（Michael D. Cohen），乔恩·厄尔斯特（Jon Elster），艾尔弗雷德·基泽（Alfred Kieser），克里斯蒂安·克雷纳（Kristian Kreiner），约翰·迈耶（John W. Meyer），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 North），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W. 理查德·斯科特（W. Richard Scott），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悉尼·温特（Sidney G. Winter）和林恩·朱克（Lynn G. Zucker）。

我们应当感谢在事件史数据分析技术方面给予我们重大帮助的人物，这些人包括迈克尔·汉南（Michael T. Hannan），特朗德·彼特森（Trond Petersen），南希·图玛（Nancy Tuma）和拉里·武（Larry Wu）。

在帮助我们获得允许、收集以及编码资料方面，要非常感谢莫琳·布玛（Maurine Burna），帕特里夏·普诺（Patricia Del Pozzo），莫林·爱普斯坦（Maureen Eppstein），诺埃尔·科拉克（Noel Kolak）以及罗伯特·坦纳（Robert Tanner）的帮助。

当然，如果没有我们家人的帮助，特别是三位优秀的女性：杰恩·马奇（Jayne Dohr March）、凯瑟琳·舒尔茨（Katharina Schulz）和薛昭慧（Zhaohui Xue）的支持，完成这项工作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目 录

CONTENTS

表目录

1

图目录

3

结论

1

第一章 组织中的规则

5

第二章 斯坦福大学中的规则

27

第三章 有关规则动态演变的一些思考

53

第四章 事件史分析方法

77

第五章 对规则产生模式的解释

100

第六章 对规则变迁模式的解释

137

第七章 规则动态演变的一些规律

158

第八章 对规则的一种思考

180

参考文献

197

译名对照表

213

表 目 录

3. 1	关于某个规则域内的变化对另一域内规则变化影响的 竞择假设	66
3. 2	关于先前产生和先前及当前废止对当前产生率影响的 竞择假设	76
4. 1	行政管理条例：规则产生的嵌套模型中所使用变量的 均值、标准差以及一阶相关系数	88
4. 2	行政管理条例：规则产生的密度模型中所使用变量的 均值、标准差以及一阶相关系数	89
4. 3	行政管理条例：规则变迁的风险率模型中所使用变量 的均值、标准差以及一阶相关系数	91
4. 4	教学条例：规则产生的嵌套模型中所使用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以及一阶相关系数	93
4. 5	教学条例：规则产生的密度模型中所使用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以及一阶相关系数	95
4. 6	教学条例：规则产生的风险率模型中所使用变量的均 值、标准差以及一阶相关系数	97
5. 1	五个行政管理条例嵌套模型的估计系数，1961—1987	103
5. 2	五个教学条例嵌套模型的估计系数，1891—1987	106
5. 3	教员大会机构时期五个教学条例产生的嵌套模型的估 计系数，1891—1967	109
5. 4	教员参议会机构时期五个教学条例产生的嵌套模型的 估计系数，1968—1987	110

5.5 教学条例产生的估计系数, 1891—1987, 通过子群测量, 使用时期效应虚拟变量	114
5.6 子群的联合斜率估计系数, 行政管理条例产生, 1961—1987	123
5.7 子群的个别斜率估计系数, 行政管理条例产生, 1961—1987	127
5.8 子群的联合斜率估计系数, 教学条例产生, 1891—1987	130
5.9 子群的个别斜率估计系数, 行政管理条例产生, 1891—1987	134
6.1 六个有关行政管理条例变化的嵌套模型的估计系数, 1961—1987	142
6.2 六个有关教学条例变化的嵌套模型的估计系数, 1891—1987	146
6.3 通过子群测量的教学条例变化的估计系数, 1891—1987	151
6.4 四个历史时期中的教学条例变化的估计系数	154

图 目 录

2.1	1891—1990 年间斯坦福大学学生和教员人数	29
2.2	1891—1987 年间斯坦福大学学位计划数目	30
2.3	1891—1987 年所有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总体收入中来源于 联邦资助的比例以及由美国议会所颁布的有关高等教育的 法案数目	32
4.1	规则史结构	78
4.2	1961—1987 年，行政管理条例，条例产生和条例变化的 次数	82
4.3	1891—1987 年，教学条例，条例产生和条例变化的次数	82
5.1	1891—1987 年，行政管理和教学条例的累积性规则产生	101
5.2	行政管理和教学条例子群	120
6.1	作为最后一次修订事件时规则年龄函数的行政管理条例修 订率	138
6.2	作为规则年龄函数的教学条例修订率	138
7.1	前一次修订时规则年龄对行政管理和教学条例变化的估计 速度的影响（模型 5）	169
7.2	先前规则变化对行政管理和教学条例变化的估计速度的影 响（模型 5）	173
7.3	在变量的抽样范围内，规则年龄和先前规则变化对行政管 理和教学条例变化的估计速度的综合影响（模型 5）	174
7.4	规则产生率的密度依赖：密度对产生率的推定效应，基于 表 5.7 和 5.9 的参数估计值	175

绪 论

这是有关正式组织内成文规则的一本书。它使用从一个特定组织——斯坦福大学——中获取的观察资料，来发展有关成文规则变化方式的思想。成文规则是组织历史中的一种特殊因素，它们在形塑组织事件的同时也受到组织事件的影响。它们被创建、修订和废止，这些行为方式留下了历史痕迹。它们具有可见性和持久性，这些特点都将不成文规则排除在外。由于这些特性，成文规则为实证地探索组织历史之动态演变提供了自然数据。它们绝非那段历史的整体记录，但它们形成了可获取的随时间推移产生的变化的档案资料。

尽管这里所叙述的研究包含了一些对规则变化之特殊事件的定量观察，但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关于规则产生和变化的历史模式与统计特征的定量调查。我们期望从这些数据中获得的思考对规则理论以及组织变迁和学习理论都有所贡献。相对于变化的实质内容或者个别特定规则的实施而言，它们着重强调了一群规则中变化比率的模式。

组织行动基于规则。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现有和潜在的规则上，组织对问题作出反应。通过解决问题的组织、分配注意力以及追逐智识的学习过程，成文规则的历史得以形成。当规则被创建、改变或废除时，它就记录了组织面对内部或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反应。外部环境的变迁通过设定问题和提供可能的规则范例影响规则。与规则相关的直接经验及其后果影响了规则。内部结构和资源的变化也影响规则。问题流以及对它们的反应创生了规则稳定性和变化的模式。

成文规则是组织经验教训的储藏所，但将新经验教训纳入规则内以及剔除旧规则的学习过程，由于其产生短视的、路径依赖的以及无效的历史而声

名狼藉。因而，虽然我们将成文规则的历史视为学习的产物，但我们并不认为学习必然会产生一组独特规则，这组规则可以从特殊情景或组织的功能必要性中预知。更确切地说，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迂回的、交互式的路径上，通过交互式的局部调适的历史，揭示出这种路径。

规则的调适具有局部性，但规则并不具有自主性。相反，它们的整合与分离取决于成文规则和规则制定的生态结构的各种障碍。局部学习拥有系统生态性的重要意义。对某个区域（Domain）或某时期规则制定的关注会影响其他区域和其他时期的注意力。成文规则的密度会影响它们相互间的自主性以及新规则创生的可能性。某个规则的变化会波及其他规则，从而在成文规则的体系内产生连续的规则创建和修订活动。这些活动受到组织职权结构的促进以及限制。

近期对成文规则的许多实证研究都是对个别规则具体内容的定性研究。它们分析了特定规则在面对组织历史的具体结构以及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意图时被精心制定或修订的方式。这种典型例子在有关美国宪法的诞生和修订的大量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以及类似的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组织规则的研究，详细说明了创生规则文本过程中所面对的压力、谈判以及协议。

这里所叙述的一些探索性研究与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我们的基本意图与它们有所区别。我们集中关注规则历史中的三类主要事件——规则产生、修订以及废止——并且试图确定影响它们的各种可能因素。相对于解释某个特定规则文本存在的原因，我们更愿意试图去理解作为规则史的文本中的变化习性以及影响这些习性的过程。因而，我们的重点是规则产生和规则变化的发生率，而不是这些变化的内容。

在这一重点的背后，蕴涵着规则史的概念。此概念在意义和相互作用中，具有丰富的细节和复杂性，但也可以作为一种可能具备的可理解变化之因果结构，此结构使规则史在可观察的规律性中得以彰显。譬如，我们思考了某个规则变化对其他规则变化可能的影响。很明显，这些影响要依赖规则所涉及的内容，因为它们定义了规则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互相影响的

性质；但比起某个规则内变化的确切内容而言，我们对它的发生更感兴趣。

根据这种视角，我们阐述了一组有关成文规则及其演变过程的简单观点。这些观点强调了下述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外部对系统的周期性重大冲击，随着规则的成熟和修订而与个别规则相关的经验以及通过一组相互关联的规则而达到的影响的扩散。这是一个某类学习的故事，其中，经历这些变化的后果以及当规则制定的注意力被调动、满足以及重新定向时，某个规则体系部分所引起的变化会引起其他部分的调整，这包括时间上稍微延后的同一规则。这些学习现象反映了多样化的组织过程，并通过这些过程而得以妥善安排。这些过程包括组织决策过程中具典型特征的政治协商、符号竞争、讨论和问题解决的整体景象。我们将规则史归因于这些过程内所具有的根本动态演变特征的结果。

正如我们将看到，规则产生和变化产生于外部和内部信号相对复杂的联合以及需要对个别事件进行深入的脉络调查的机制。然而，与此同时，它们具有一些源于组织生活内部位置的一般统计特性。组织规则以系统化的方式得到发展。为了详细阐述位于规则史系统化特征内部的基本现象，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与规则文献类似的三个重大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处理规则和学习之间的关系。组织中的规则既可以看作学习的产物也可以视为知识的携带者。实际上，任何组织学习的理论都似乎将规则视为某个组织能力积累的重要因素。随着组织解决它所面对的政治和技术问题，我们将展示规则如何随之而发生演化，以及它们如何调和过去和当前的行动与经验教训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二个问题处理规则以及科层化之间的关系。科层制与规则，以及更为精确的是与规则扩张的趋势相关。科层化规则也与有关科层稳定性以及刚性的观点相关。我们将揭示规则随时间得以积累的趋势和这种积累以下降的速度发生的现象。并且我们还将揭示，尽管规则发展在科层机构中创造了显著的稳定性因素，它也产生了不稳定和变化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变得更加稳定，同时减少了规则产生和变化；同时，当源于环境的压力迫使规则做出调整以及随着某个规则内的变化引起其他规则的变化时，通过修订，

规则变得更不稳定。这种结合导致了这样一种科层制，它既不非常稳定也不非常敏感。

第三个问题处理历史的效率。我们问到：个别规则是否独立于个别的功能需要而自主发展，这反映了当前外部环境针对存续和有效性的要求。这样一种历史效率的观念是许多规则思考的基础。我们的研究显示，规则发展反映了一种低效率的历史。将政治和技术问题转化为规则的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力、前期经验以及规则生态，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任何一种规则和环境间具有独一无二匹配性的简单假设无效。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局部化的调适，规则才得以发展，这些调适产生了被视为历史剩余物集合的规则丛。并且在形塑和解释后继的事件之中，这些调适自身都具有影响力。在该发展过程中，规则的生态情境和规则史都至关重要。

尽管这个主题单调乏味，但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对规则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中地位的思考非常普遍。实际上，现代历史以及它们在口述传统和神话的前身的许多因素，都因围绕着规则的讨论而组织起来。有关规则概念的连续性，反映了对规则史的关注。譬如，将成文规则视为是从上帝那里获取之物的观念与现代将规则视为组织领导者特权的观念相呼应。这种对规则关注的历史扩展到了当代的社会组织中。

· · · · · 规则的中心性 · · · · ·

从更宽泛的视角而言，规则由调节个体行为以及个体之间互动行为明确或隐含的标准、规章和预期所构成。它们是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现实，个体和集体行动由规则所组织，并且社会关系也经由规则协调。事实上，规则是人类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既是文明的基础，但也是文明生活的毒素。它们既赋予科层机构能力，同时也赋予其恶名。尽管它们经常由于被规避或受到反抗而获得荣耀，但它们也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个体行动理论中的规则

在相当程度上，大多数人类行动基于规则。规则为适当性行为施加了认知和规范限制。个体采取行动以实现其身份期望，后者定义了某个特定身份所暗示的内容或者在一个特定情景（Situation）中什么行动被认为具社会性或道德性。从这种观点出发，相对于对行为的不确定后果的预期和行为偏好

而言，它们更多是受到在规则结构和身份定义中所反映的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驱动（March, 1994a）。慎重的行为个体被假定为按照身份和情景相匹配的方式而行动。他们问自己：我是什么类型的人？这是怎样的情景？像我这样的人该如何在类似这样的情景中行动呢？

因此，规则涉及三种建构。首先是自我的建构，哪种是我与之相关的身份？其次是现实的建构，我如何编码包含我自身的情景？再者是这两者之间匹配性的建构，在我已经定义的情景中，我的身份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

自我、现实以及这两者之间匹配性的建构涉及了个体对身份的追求、对现实的社会性解释以及连接它们的适当方式的协商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部分是经由某个组织中正式的、成文规则和定义了身份、情景以及两者之间匹配性的规则所协调。当旧身份、情景随时间推移变得不太适宜，并且随着新身份和情景的出现，规则就被创建和修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行动基于规则的这种观念是有关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观点的特征（Durkheim, 1933; Merton 等, 1952; Douglas, 1973; Edgerton, 1985; Shils, 1975）。然而，近年来，它对于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观念的重要性也变得显著起来（Nelson and Winter, 1982; Anderson, 1983; North, 1990; Zhou, 1997）。

基于规则之行动的观点通常与基于选择之行动的观点形成对照。后一种观点将行动与对其他后果的预期联系在一起，通过事先偏好——一种因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而非适当性逻辑来衡量。因果逻辑是现代理性理论的基础，包括有限理性和多人策略理性（Multiperson strategic rationality）（March, 1994a）。它们假定，个体预期他们行动的可能后果，之后采取最符合其利益的那些行动。尽管这些预期可能会受到各种不充分条件的影响，但行动的动力仍然是根据个体的以往偏好而作出的对后果的预期以及对这些后果的评估。从这个角度，规则变为工具；它们的出现服务于个体或各种不同个体的利益，并且当其不再有利于相关行动者的目标时，它们就会被修改或者废除。

这两种观念的冲突有时被这样一种趋势弄得有些滑稽，即每一种观点的倡导者都将另外一种观念视为他们自己观点的特例。理性的工具主义被社会

学家简单地视为一组规则，而规则被经济学家视为理性解决某些重复博弈的简单方式。然而，在近来描述人类行为的努力中，这些相互包容的立场逐渐转向这样一种视角，即认为这两种行动的逻辑相互交织，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竞争或相互包容。很少有热衷于适当性逻辑的人会否认理性在适当性行为形成中的重要性尤其在一些特定的人类场景中，或者否认理性是解决身份冲突的方法的重要性（Goode, 1973）。并且，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近来有关因果性行为的解释已经越来越强调规则和制度在阐述理性行动发生受到限制中的作用。“博弈的规则”已经被视为基于因果之行动的重要特征。

人类社会理论中的规则

规则以及基于规则的行动是所有我们已知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人类行动以规则为基础组织起来，这些规则组合、创建并维持了社会系统。规则作为协调和控制之主要工具的地位在法律和管理的理论中有所反映（Dworkin, 1967; Elster, 1989; Fuller, 1969; Brennan and Buchanan, 1985; Walker, 1988）。当代的等级制、市场以及国际关系都由以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制度所支配。长期以来，有关行为的规则都被视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难题的解决方法（Parsons, 1982）。从远古时代开始，互惠就曾被视为社会和经济交换的金科玉律。无论在部落还是现代社会中，团结和权威都被认为是建立在因明确和模糊的规则而产生的对于稳定关系的预期之上。实际上，涂尔干（1933）认为，在从机械（封建）社会向有机（市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当管理社会的相互承认之规则崩溃时，失范就有可能产生。

某种程度上，规则的中心性源自它们作为集体生活之象征性产品的地位。即使在它们对行为影响有限的地方，它们仍然是秩序的象征。它们是讨价还价的战利品，记录了冲突的结果。它们是意向的表达和德行的宣言，得以将价值的道德性和情境行为的协调相提并论。它们是社会秩序的神圣文本。从最早期的人类历史记载开始，规则体系就被视为文明的基础。